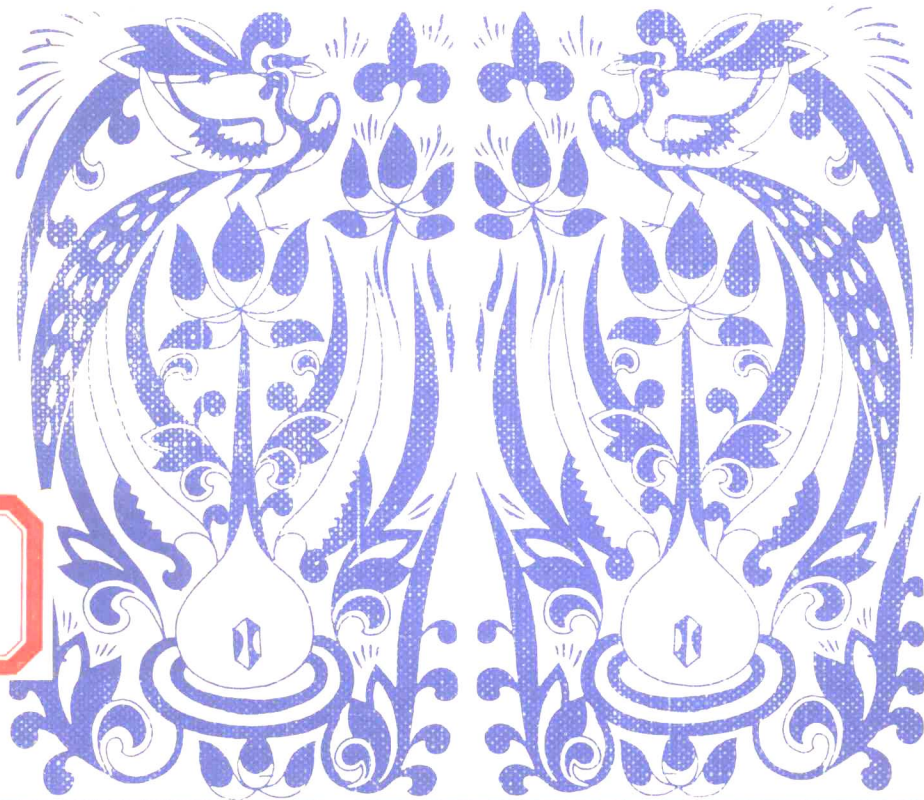


WEIJINLIUCHAOWENXUE  
YUXUANXUESIXIANG

# 魏晋六朝文学 与玄学思想

袁峰 著



2

三 秦 出 版 社

魏  
晋  
六  
朝  
文  
学

与  
玄  
学  
思  
想

(陕)新登字 006 号

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

---

袁 峰 著

出版发行 三秦出版社  
新华书店经销  
社 址 西安市糖坊街俭家巷小区副 3 号楼  
电 话 (029)7264325 7263801  
邮政编码 710003  
印 刷 西北工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3 千字  
版 次 1995 年 12 月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标准书号 ISBN 7-80546-993-8/I·295  
定 价 12.00 元

---

## 内 容 提 要

魏晋六朝时期的学术思想是在承袭先秦两汉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主流是既讲道德又讲道理的,其末流则逐渐走向相反的方面。“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既是变易之学的核心,又是人文精神的基准。汉人用一种知性化的眼光看待圣神,圣是超凡的圣,神是“知人之所不知谓之神”,这种“称圣则神”的观念将人文精神的神圣性神学化了。在汉代经学消解之际,诸子之学蜂拥而起,一种新的开放的百家之学氛围冲破了“独尊儒术”之僵化性桎梏。魏晋思想在本质上虽然并未摆脱天人合一之羁绊,但魏晋人文精神却在挣脱天人感应的思维模式中迫使天人关系改变了形式,并使自己获得了更多的“独化”性内容。太极作为人文精神的本体,在魏晋学人对三玄的探讨中通常被称作道;人文意义上的道既应该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又应该是一种有思想的内容。在“天不变,道亦不变”思想禁锢下,汉人或者因拘滞于人文精神的儒教“意味”(在经学中)而没有处理好人

文精神的形式，或者因沉溺于人文精神的“铺采摛文”之形式（在辞赋中）而没有把握好人文精神的内容。在汉晋思想转化之际，魏晋学人强调“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主张以“适时之变”来改造汉儒的天道观念，从而使“天”不断形名化和自然化，同时，亦使道的观念不断义理化和理性化。在儒道互补的圣人与神人相互统一的意义上，人文精神的神圣性是在既合道德又合道理中走向“道之极”的。魏晋人用一种理性化的眼光看待圣神，“神者，自然之根也”；神圣是在自然之根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圣人虽然具有茂于常人之神明，但却具有同于常人之五情。这种“称圣不神”的思想既缩小了圣人与常人的距离，又丝毫未降低理想人格的标准，从而使人文精神的神圣性在“不知神圣之为神圣”的自然化中实现了自身。汉魏思想的演变，走过了一个从粗到精的过程，汉代学人拘滞于事物的粗糙象数，从而给学坛上堆积了许多繁言琐语，人文在繁琐哲学中被僵化了，所以，汉儒虽然讲天人感应，却难以将健康的感性还给人，其理性的升华更无从谈起。“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在老庄思想崛起之际，魏晋学人以事物的精意匹配圣人的神明，其思想革命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找到了一种精致的人文义理。这种义理从数理方面来看，所要抖落的是“四十有九”之繁琐象数，所要实现的是“其一不用”之本体，例如，王弼所反复阐述的就是这种“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的人文精神之义理。从言、意方面来看，这种人文“语之所贵者，意也”；贵言论者力图用一种言之有物的形式，去表达一种有思想的内容，这就将人文精神的合道理性和合道德性大大地朝前

推进了一步。

曹魏在政治上用一种比较倾向于分权的形式取代了汉王朝的大一统专制，但在思想上并不公开表示抛弃儒教，而是用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方针慢慢地疏解儒家的影响，克服儒教的固有弊病，从而寻求用一种健康的感性和理性方式，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建安文学与正始玄学代表了这种寻求的最高成就。早在本世纪初，鲁迅先生在一次关于魏晋思想的讲演中就提出了“文学自觉”的命题，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这种自觉的理论涵义是：人的精神既自觉到了自身的存在价值，又自觉到了自身的文化形式；所谓存在价值，是就道德性而言；所谓文化形式，是就道理性而言。在鲁迅先生以后，汤用彤先生在研究魏晋玄学中提出了“汉代相人以筋骨，魏晋识鉴在神明”的著名论断，本文在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一节中补充指出：在“汉代相人以筋骨”到正始以后“识鉴神明”之间，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过渡环节，这就是建安品人重风骨，建安人继承了汉人思想中的筋骨，并将这种筋骨砥砺成自己所独有的“意气骏爽”、“结言端直”之风骨，从而开启了正始之音中“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之神明。80年代初，李泽厚先生曾经以人的主题概括了魏晋时代的美学风貌。笔者认为，曹魏时代人的主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感性上的爽朗刚健，二是理性上的通脱简易，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正是从此不同的两个方面操作着这种人的主题。真正的文学与哲学，都离不开人的主题，但两汉经学禁锢人性长达数百年，而人的主题在被压抑中从所谓的“异端邪说”中冒出。到了汉末，随着旧的封建王朝的崩溃，这种异端邪说

使反正为新思潮的火种，而人的主题便在合道理与合道德中演化成魏晋思想的主流。

## Abstract

The thesis is about the study of the literary ideas and metaphysical ideas during Wei and Jin times (220—420). The author's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oroughly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in the trigonometric structure of humanity,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and to analyse the relevant representative figures and their basic ideas. Although the thought of Wei-Jin times didn't cast off intrinsically the yoke of intercourse of heaven and human being, humanistic mind of Wei-Jin times compelled the relation between heaven and human being to change its form b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mode of unified thinking of heaven and human being, and made itself to gain more contents of "individualizati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 metaphysics of Wei-Jin times found a common character under the banner of humanity, but then they began to develop in different qualities of the perceptual and the rational. The non-synchronism of the perceptual and the rational made the flourishing climax of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not arrive at the same time, but the metaphysical flourishing in Zheng Shi period that followed the flourishing literature of Jian An period conformed to the law of from the perceptual to the rational. There was no qualitative 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literature of Jian An and the metaphysics of Wei-Jin in the meanings of humanistic spirit, but there was a certain degree



of disparity between them in the meanings of emphasizing on imagination and on meditation. During the time of humanistic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people firstly made their imagination with a mode which was difference from the Confucianists of Han times, and then mediated with a mode which was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Confucianists of Han times. The former shook the Confucian ethical code of the end of Han times perceptually, and caused its collapsing; the latter renovated the sense of people with a new atmosphere, and called for the birth of new rational. When the perceptual of the literature affected the rational of people and asking for the formation of a new ideological system, the task was relying on the metaphysicians like Heyan, Wang Bi, Guo Xiang and so on to accomplish. When the rational of metaphysics affected the perceptual of people and called for a new aesthetic realm, the task was relying on the writers like Tao Yuan Ming to accomplish. Literature and metaphysics served as a powerful weapon for the thinking liberation during the periods of Wei-Jin, Northen and Sourthen Dynasties.

## 序——张岂之

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玄学的研究，目前已经出现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成果。在本世纪初，刘师培就曾在北京大学开出中国中古文学史课，并撰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对魏晋至隋唐的文学变迁作了提要式的整理。后来汤用彤先生曾对这一时期的玄学思想作了探索，他对玄学发展阶段以及玄学基本命题的剖析，至今仍是享誉学界的重要成果。汤先生还探索过玄学思潮与文学形式的相互关系，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观点。这些观点后来又被任继愈先生以及研究中国中古文学的先生们加以进一步阐述。

袁峰同志多年从事于魏晋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后来他又报考中国思想史专业，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他选择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与玄学思想》作为他的研究课题。论文写出来后，我们请有关专家进行评审，大家都认为他已基本熟悉近代学者关于这一课题的相关成果，并能够独立自得地就某些问题进行深入辨析和阐发，论文具有较高的质量。

袁峰同志取得这些成绩是很不容易的。他家境较为困难，年过而立，但他对学术研究有一股献身精神。他做事认真，人一己十，人十己百，能为人之所不为，忍人之所以难忍。

他的论文经过修改补充，现将以《魏晋六朝文学与玄学思想》为题出版，我感到很欣慰。对于魏晋文学与玄学思想的关系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衷心希望此书能给当代学人研究这一课题提供一些帮助，也希望它能激励袁峰同志更上一层楼，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更大的进步。

1996年3月

---

## 绪 论

关于魏晋六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国内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依旧有许多工作有待学人去做。就研究方法来说，专门学科的研究有助于问题的深化，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亦有利于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把握，不同的方法各有所长。本文站在魏晋文学与玄学的交合点上来探讨其人文精神的具体意蕴之方法，可能是属于跨学科研究一类，但这种研究本身却已有例在先。例如，汤用彤先生就曾写有《魏晋玄学和文学理论》一文，受汤先生的影响，孔繁先生亦著有《魏晋玄学和文学》一书，另外，近年来的学术书刊上亦有一些有关这方面的论文。愈是具有创造性的研究，愈是离不开对前人思想的吸取和继承，这在笔者看来是无可置疑的。但同样无可置疑的是，所有的继承和吸收，只有在化成作者的血肉时，才会是有效的。本文广泛地涉猎前人研究成果的目的是想在人文——文学——玄学的三角构架中透彻地表达文学与玄学思想的关系，而不是为了研究文学与玄学各自本身，这一点是应该申述清楚的。不过，透彻的关系论如果离开了相关的对象，那就会变成一种不切实际的神话，这篇论文没有变成神话的主要原因是在于笔者并未放过魏晋文学与玄学的代表人

物来谈二者的关系。所以，建安时期的三曹和建安七子，正始时期的何晏、王弼、夏侯玄，竹林时期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七贤”，西晋时期的向秀、郭象和陆机，东晋至南北朝时期的葛洪、陶渊明、刘义庆和刘勰，所有这些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及其主要的思想观点，笔者是不能不进行认真的分析的，至于在何处分析比较何人，何时分析比较何种观点，这却必须服从关系论的主题。

概括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太极”亦是汉魏易学之中心观念。在易学中，人处三才之中可以“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而“天地之文”又以“物相杂”的身份显示自己。就儒学来说，人文和“性与天道”观念联系密切。尽管圣人未留下论述“性与天道”的抽象文字，但《论语》中的“性与天道”本身依旧深刻地影响了后人的思维框架。汉儒言“性”主张“生而然者也”；正始以后的学人不满足于这种“生而然”之性，进而追求客观的自然之性和主观的“心性”。例如，王弼就主张在自性与自然的逍遥为一中“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刘勰亦主张“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应该在“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的基础上去通达文学的“情采”和本性。汉儒言“天道”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魏晋学人强调“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主张以“适时之变”来改造汉儒的“天道”观念；从而使“天”不断形名化和自然化，同时，亦使“道”的观念不断义理化和理性化。在儒道互补的圣人与神人相互统一的意义上，人文精神的神圣性是在既合道德又合道理中走向“道之极”的。汉人用一种知性化的眼光看待圣神，圣是超凡的圣，神是“知人之所不知谓之神”，这种“称圣则神”的观念将人文精神的神圣性神学化了。魏晋人用一种理性化的眼光看待圣神，“神者，自然之根也”；神圣是在自然之根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圣人虽然具有茂于常人之“神明”，但却具有同于常人

之五情。这种“称圣不神”的思想既缩小了圣人与常人的距离，又丝毫未降低理想人格的标准，从而使人文精神的神圣性在“不知神圣之为神圣”（《老子·六十章》注）的自然化中实现了自身。汉魏思想的演变，走过了一个从粗到精的过程。汉代学人拘滞于事物的粗糙象数，从而给学坛上堆积了许多繁言琐语，人文在繁琐哲学中被僵化了，所以，汉儒虽然讲天人感应，却难于将健康的感性还给人，其理性的升华更无从谈起。曹魏学人思想革命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找到了一种精致的人文义理；这种义理所要抖落的是“四十有九”之繁琐象数，所要实现的是“其一不用”之本体，王弼所反复阐述的就是这种“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的人文精神之“太极”。

魏晋六朝是一个不平衡的历史时期，这种不平衡的积极意义在于打破平衡的枷锁，用一种新的开放的耗散结构去拥抱外界和现实，从而为历史的发展吸取更多的动力和燃料。曹魏在政治上用一种比较倾向于分权的形式取代了汉王朝的大一统专制，但在思想上并不公开表示抛弃儒教，而是用一种兼容并包的思想方针慢慢地疏解儒家的影响，克服儒教的固有弊病，从而寻求用一种健康的感性和理性方式，来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建安文学与正始玄学代表了这种寻求的最高成就。“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用刘勰的话来讲，魏晋人文精神是以“夷泰”的形式实现自身的，其中经学的消解为诸子之学的复兴提供了机遇，而名法之治和名理之学发展到正始时期会归为何晏、王弼的贵无论。中国古代素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汉魏六朝当然不能例外，譬如，司马迁、班固的主要贡献在于史学，但刘劭《人物志·流业篇》却视他们为文学家而未作为史学家。老子的主要贡献在于哲学，王弼注《老子》亦着重阐发其哲学思想，但他在《周易略例》中却称名“五千言”为“老子之文”，而未称其为“老子之论”。刘勰论

文,更是将所有著之于竹帛的文字都包括在自己的论述对象之内。早在建安时期,曹丕便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所谓文、史、哲不分家,主要是着眼于广义的“文本同”的方面而言;至于人文的“末异”特点,魏晋思想在这方面的造化同样非同小可;因为魏晋时期,不但玄学中出现了“独化”性的理论,社会上出现了“独化”性的自由人格,而且至南朝宋文帝时期,还出现了“独化”性的人文学科,当时的文学和玄学都在官方的教育机构中被列为独立的学科。

魏晋思想在本质上虽然并未摆脱天人效应之羁绊,但魏晋人文精神却在挣脱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中迫使天人关系改变了形式,并使自己获得了更多的“独化”性内容。天地的权威虽然未倒,但重点已转向人的主题;对于天地之理解,主要已不是天文、地文之外在形象和象数,而是内在的人文意义上的义理。思想着的人不能脱离人的思想,而人的思想却可以分离成想象和玄思两个部分,前者以心象的形式把握外在对象,后者以概念的形式将想象着的感性材料升华为理性。在人的主题旗帜下,魏晋文学与魏晋玄学找到了共同点;在感性与理性的不同质点上,二者开始分化。感性与理性的不同步性使得文学与玄学的高潮并不同时到来,但正始玄学继建安文学之后得到繁荣却是从感性到理性之规律使然。在人文精神意义上,建安文学与魏晋玄学没有质的不同;在偏重于想象与偏重于玄想意义上,二者产生了一定的差别。在汉晋人文精神转变之际,人们首先是以不同于汉儒的方式进行想象,然后才以不同于汉儒的方式进行玄想。前者从感性上震撼了汉末名教并使之动摇和崩溃,后者从氛围上刷新了人的耳目并呼唤着新理性的诞生。偏于理性的玄学与偏于感性的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不同部类,既无判然划界,亦无贵贱之分;当文学上的感性撞击人们的理性并促使其形成思想体系时,

这种任务有赖于何晏、王弼之类的玄学家来完成；当玄学上的理性影响人们的感性并要求新的审美境界时，这种任务有赖于陶渊明那样的文学家来完成。魏晋文学与玄学思想的深层意蕴还可以从性情之理与言意之辩方面进行窥探。人的主题从“自然之理”的角度看，是人向自然的复归；从“神者，自然之根也”（《大人先生传》）的角度看，是人的精神性情在自然中寻找自身。“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释私论》）；人与自然在形神统一的意义上不只是精神不应“丧其自然之质”，而且也在于自然之质中应该具有人的质性神韵。魏晋思想重在强调“得意”、“畅神”，其“得意”忘言重在强调获得性情之意理，其“得意”忘形重在强调获得意理之性情。就“得意”之“意”而言，玄学中的“意”与文学中的“意”具有“本同而未异”的质性。玄学中的“意”偏于“识”，文学中的“意”偏于“情”；识情都通于“神明”，但“情”是“神明”之皇冠，而“识”是皇冠上的明珠。



## 目 录

绪论·····	(1)
<b>第一章 汉魏思想的演变及其人文精神的独化</b> ·····	(1)
第一节 汉魏学术思想之演变·····	(3)
一 经学的消解·····	(4)
二 诸子之学的复兴·····	(9)
三 天人关系的新形式·····	(14)
第二节 人文精神的“独化”·····	(16)
一 自然与自性的高扬·····	(18)
二 本体和自由精神·····	(22)
三 道之变与独化·····	(27)
<b>第二章 建安文学对魏晋玄学的影响</b> ·····	(34)
第一节 建安风骨与正始之音·····	(35)
一 从曹、王到何、王·····	(36)
二 从渴求贤才到才性论·····	(43)
三 从慷慨任气到识鉴神明·····	(48)
第二节 文学的自觉与玄学理论·····	(54)
一 文学的自觉·····	(55)
二 文气论与论说文·····	(57)
三 本同与末异·····	(61)
四 正学、析辩与名实·····	(64)
<b>第三章 魏晋玄学对魏晋文学的影响</b> ·····	(68)
第一节 魏晋玄学本体论和自然之道·····	(69)